

暨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国际关系变动中的东南亚华文传媒

姓名：陈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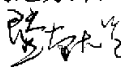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国际关系

指导教师：周聿峨

20040101

独创性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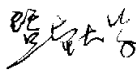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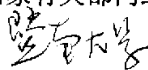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  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 2004年4月28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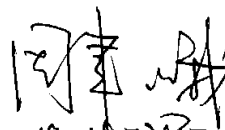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  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  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 2004年4月28日

签字日期: 2004年4月28日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内容提要

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历史是一部兴衰相错的发展史，既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热闹、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荣和战后初期的鼎盛，也经历了日占时期的近乎绝迹、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衰退以及近年来的复苏。导致东南亚华文传媒兴衰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把东南亚华文传媒置于国际关系的视野，结合新闻传媒和华侨华人的角度将这些因素归结为受众因素、传媒性质、中国因素、东南亚局势、国际环境以及传媒的技术、人才、经营管理等方面，认为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决定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兴衰发展。同时，通过对上述因素的分析，认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前景乐观，并呈商业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等方向发展。本文的新意在于，把新闻传媒、华侨华人及国际关系等分析层次结合起来，对东南亚华文传媒兴衰相错的发展现象进行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解释。

关键词：华文传媒 东南亚 国际关系

ABSTRACT

History of Chinese media of Southeast Asia is complicated and changeful. It had been prospering in three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or 1930's, and in the initial stage after World War II. Otherwise it had been declining in the World War II and 1960's or 1970's, and it has been recovering in recent years. By th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s media, and Overseas Chinese, this thesis thinks audience factor, character of Chinese media, China factor, international and Southeast Asia's situation, and media technology, talent and management ar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media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inks changes and influences of these factors have determined the change of Chinese media of Southeast Asia. Meanwhile, by the analysis of above factors, this thesis thinks the prospect of the Chinese media of Southeast Asia is optimistic, and commerci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re developing directions. Innovation of this thesis is the systemic and overall explanation for Chinese media of Southeast Asia by analyzed news media, Overseas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ynthetically.

Key words: Chinese media;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和理论概述

一、研究的问题、目的及意义

东南亚华文传媒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从 1815 年第一份海外华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诞生之日起，东南亚就一直是海外华文传媒的中心，在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但如此，作为联系华侨华人社会，联系华侨华人与东南亚其他族群，以及联系华侨华人与中国的纽带，东南亚华文传媒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乃至整个东南亚社会的发展中也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一部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史，也是东南亚社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一个多世纪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波澜曲折的遭遇，东南亚华文传媒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从宗教传媒时期的缓慢发展到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时期的热闹，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荣到日占时期的近乎绝迹，从“二战”结束初期的鼎盛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衰退，再到近年来的迅速复苏，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可谓大起大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东南亚华文传媒兴衰相错的发展？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前景如何？又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东南亚华人社会、当地政府乃至我国政府值得关心的问题，也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外的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和成果。仅就国内而言，近年来就有多本海外华文传媒专著面世，如方积根、胡文英的《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杨力的《海外华文报业研究》、王士谷的《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程曼丽的《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等，相关的学术论文和涉及东南亚华文传媒的著作更多。这些论著都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历史发展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不过，这些研究更多是基于历史学、民族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层面，而单独地对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尤其是置于国际关系视野的论述较为少见。

基于此，本文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系统地、综合地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变迁进行因果分析，既有历史的，也有新闻传播的，当然更多是从

近两个世纪以来复杂多变的国际变迁中探究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逻辑,以期得出更贴近历史真实、也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诚如上文所言,东南亚华文传媒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其他地区的华文传媒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其他外侨(裔)传媒所不具备的。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1、东南亚众多的华人人口。东南亚华人人口多达 2700 万,约占海外华人的 80%,这是东南亚华文传媒得以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础。

2、自成体系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具备完整社会体系的外侨(裔)社会,华文传媒作为华侨华人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充分地发挥着信息传递、舆论导向、知识传播等功能。

3、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曲折历史。动荡曲折的社会往往更能突显大众传媒的作用,在东南亚华侨华人起伏不定的历史遭遇中,华文传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拥有重要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的标识。

上述因素决定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因此,东南亚华文传媒的研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价值。而把华文传媒的研究与国际关系联系起来,则又增加了另外几层意义:

从理论上,华文传媒的研究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既是“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化和具体化,也为“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案例。近年来,在国际华侨华人研究热的背景下,“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华文传媒研究作为华侨华人研究的子领域,必然要纳入这一研究课题之中。

事实上,作为一个跨国民族,华侨华人总是与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外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总是受制于国际关系的形态和变化。因此,任何对华侨华人宏观问题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国际关系的大框架。换句话说,只有在国际关系的变迁之中,才能对华侨华人问题的变化规律做出合理的解释。华文传媒的研究自然不能例外,其他华侨华人课题的研究亦然——在这个意义上,华文传媒研究与国际关系的结合不仅丰富了“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对其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从实践的角度看,对东南亚华文传媒兴衰规律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

东南亚华文传媒复杂多变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对东南亚乃至其他地区的华文传媒的未来发展做出预见并为之提供导向性意见。在政策层面,这一研究一方面对各居住国的华文传媒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又能为中国的侨务政策和国际传播战略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从而使东南亚华文传媒得到健康发展的同时,能够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为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挥传播的桥梁作用。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国内外华侨华人研究和华文传媒研究当中,“华侨”和“华人”,“华文传媒”、“华侨传媒”和“华人传媒”等都是频繁出现却又容易引起歧义和争议的概念。因此,为了论述的准确和理解的顺畅,有必要对这些概念先行界定。

1、“华侨”与“华人”

据记载,“华侨”这一概念大约出现在19世纪末,在进入20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广泛的运用。早期的“华侨”指的是居住在国外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在1909年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国籍法之后,“华侨”开始有了法律的含义,指居住在国外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人。而“华人”这一概念的确立和流行则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许多华侨放弃了中国国籍而加入了居住国国籍,于是,“华人”就用来指这些具有中国血统却加入外国国籍的人。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学界对“华侨”与“华人”这两个概念的含义都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华侨”和“华人”的文化特性上,即“华侨”和“华人”是否应具备中华文化特性和意识,因为随着华人移民及其后裔“本土化”和“公民化”深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不懂中文,不认同中国,甚至不具备中华文化特性了。这些人是否属于“华侨华人”的范畴?“华侨”和“华人”这两个概念是否还继续受用?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最多的问题。在这些争论之中,学术界转向对“华族”、“华裔”等概念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新

的观点。

就本文而言，参与这些争论并不是论述的重点，也不打算对这些争论和“华族”、“华裔”等概念进行系统的介绍和讨论。本文将沿用“华侨”和“华人”的传统概念，原因主要在于：从历史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总是和国际关系的变迁、尤其是中国因素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而且自始至终贯串着国家利益的纷争，因此，选择更具中国情结和国际法意义的“华侨”和“华人”来解释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变迁是恰当的。

需要说明的是，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往往是共存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华侨社会转型之前，东南亚存在一些具有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的华人；而在转型之后，也有一定数量的东南亚华侨没有加入当地国籍，而继续保持华侨身份。不过，无论是华侨社会时期的华人还是华人社会时期的华侨，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都不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本文在论述过程中，并没有特别考虑这一点，而是基于区别华侨社会与华人社会的需要，在转型之前一般使用“华侨”概念，之后则使用“华人”概念。至于华侨和华人的通称和其他用“华侨”或“华人”都不能准确表述的概念，则一概用“华侨华人”来称谓。

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华人移民”概念的使用。这里的“华人”显然不是指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而应是指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只是由于东南亚华人移民包括来自中国的移民以及华侨华人的二次移民，使用“中国移民”等概念容易引起歧义，因而沿用“华人移民”的概念，并在此作特别说明。

2、“华文传媒”、“华侨传媒”与“华人传媒”

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华文传媒指的是我国（包括台港澳地区）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创办的中文媒体。这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就媒体形式而言，它既包括报刊，也包括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就涵盖的范围而言，既包括华侨华人在海外创办的中文媒体，也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人士在海外创办发行的中文媒体，还包括外国人在中国以外地区创办的中文媒体；就接受的对象而言，主要是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但也包括具备华文理解能力的外国人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和网络媒体的兴起，在中国国内创办的中文媒体往往在海外也有接受，

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国内创办的以海外人士为对象的中文媒体也应纳入华文传媒范畴。不过，为了区分华文传媒和国内中文传媒的差别，反映中国以外地区华文传媒事业的发展及其政策环境，笔者认为以创办地原则界定华文传媒是合适的。

“华侨传媒”和“华人传媒”分属“华文传媒”的一类，与“华侨”和“华人”概念相对应，“华侨传媒”指的是华侨创办的中文媒体，“华人传媒”则是指华人创办的中文媒体。需要说明的是，华侨华人创办的外文媒体以及华人在中国国内创办的媒体均不属于“华侨传媒”和“华人传媒”的一部分。因为外文媒体以外语人士为接受对象，是外语传媒的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创办的媒体服务于国内大众，与中国国内传媒无异，因此把这两类媒体归于“华侨传媒”或“华人传媒”有悖于我们研究海外华文传媒之目的。

据此，我们可以依“创办人是谁”的标准，把华文传媒分为华侨传媒、华人传媒和外国人创办的华文传媒三类。

而以上述的界定原则，我们很容易推出“华文报刊”、“华侨报刊”和“华人报刊”等概念的含义和从属关系，这里勿需赘言。

需要说明的是，华文传媒是华文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的总称，但从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历史看，东南亚华文传媒主要以华文报刊为主，因此，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也主要以东南亚华文报刊为例，解释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兴衰发展。

三、理论概述

正如上文所言，要解释复杂多变的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史，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系统的、综合的分析。从总的来看，东南亚华文传媒的研究离不开对新闻传媒的研究，也离不开对华侨华人的研究，还离不开对东南亚和国际关系的研究。

1、从新闻传媒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

东南亚华文传媒是作为新闻传媒存在的，因此必定遵循新闻传媒的规律而产生、发展。

首先，新闻传媒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受众基础。从经济层面看，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以及人与人交往的频繁必然导致信息交流的需要，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新闻媒体的产生和发展成为可能，这是新闻传媒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从政治层面看，各种政治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需要对社会舆论进行控制、引导和影响，从而也产生对新闻传媒的需求。在文化层面，社会的发展不但需要文化和知识的传播，也增强了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新闻传媒则是满足这些要求的重要形式。从技术层面看，传媒技术对新闻传媒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使印刷传媒的诞生有了可能，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声像传媒的普及，而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则使新闻传媒进入了网络传媒时代。从受众的角度看，任何新闻传媒的存在都需要一定数量的新闻受众，这些受众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经济基础，使之能够接受和理解传媒传递的信息。以上这几点就是新闻传媒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东南亚华文传媒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也是随着这些因素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

其次，新闻传媒强大的社会功能必然导致各类势力的介入。新闻传媒具有传递信息、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推销商品、丰富生活等社会功能，这不仅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人的思想、观念乃至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新闻传媒不仅仅是社会沟通的媒介，更是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思想工具。这些功能的存在必然导致各类势力对新闻传媒的介入，政治势力借助传媒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经济集团利用传媒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同文化之间也依靠传媒扩大自己的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整个发展过程贯串着各种势力的介入，它们或推动了华文传媒的发展，或压制了华文传媒的发展，东南亚华文传媒正是在这推动或压制中兴衰起伏。

再次，新闻传媒的性质对传媒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里的性质主要是指传媒是为谁服务的，是政治性的还是商业性的。这些性质对传媒的发展影响重大，如果是政治性传媒，那么它往往受某种政治集团的资助，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而不计较商业上的得失，主要受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因而发展起来快，只要有政治需要就可以出版发行；衰落也快，一旦缺乏政治需要或受到政治压制就会迅

速衰落。如果是商业性传媒，那么它主要依托于受众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需要，主要受经济形势和商业运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不过，大多数的传媒都是两者兼备的，既必须考虑商业的回报，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而传媒的政治倾向性必定会对传媒的发展产生影响，它一方面受到其服务对象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遭受对立面的压制。就东南亚华文传媒而言，政治倾向性主要体现在其倾向中国还是倾向居住国，在华侨传媒时代，东南亚华文传媒在政治上效忠中国，因而常常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并在东南亚各国独立后被迫改变效忠对象，向华人传媒过渡；其次是其倾向于中国的哪个政治派别，这使东南亚华文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分成了立场相背的两派。

简而言之，东南亚华文传媒作为新闻传媒，受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及受众等因素的左右，也受自身性质的重要影响，这是我们分析东南亚华文传媒兴衰的重要线索之一。

2、从华侨华人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

显而易见，华文传媒总是和华侨华人联系在一起的，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兴衰发展也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历史遭遇密切相关。虽然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和东南亚各民族之间频繁交流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开始阅读或观看华文传媒，甚至积极参与到华文传媒的建设中来，但是，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从总的来说，东南亚华文传媒实际上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新闻传媒，东南亚华文传媒史实际上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传媒史。

首先，东南亚华文传媒是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增加和华侨华人的自然增长构成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受众基础；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华文传媒的需求，也为华文传媒的创办发行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华文教育的发展则提高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使华侨华人转化为华文传媒的受众成为可能。

其次，东南亚华文传媒深受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政治经济斗争的影响。东南亚华侨华人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必然导致各种政治经济势力的介入，华文传媒作为功能强大的舆论工具，始终与东南亚华

人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斗争联系在一起。

其三，自成体系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和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曲折遭遇强化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地位和作用，也加深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影响。华文传媒是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不但由华侨华人创办，也为华侨华人服务，传播的内容也主要是华侨华人社会及与华侨华人密切相关的中国和居住国的新闻。在东南亚华侨华人曲折的历史遭遇中，华文传媒传递着华侨华人的信息，也传递着华侨华人的诉求，自然也脱离不了华侨华人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

华侨华人传媒的性质赋予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独特的内涵，因此，东南亚华文传媒的研究必须从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华文教育及华侨华人政治经济等华人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分析。

而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就不能不对中国国内的形势及中国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关系进行分析，这是由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之间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文化传统以及在此基础形成的共同利益决定的。尤其在双重国籍解决之前的华侨时代，东南亚华侨虽然身处异地，但心向中国；中国政府也视华侨为海外子民，设立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管理。东南亚华侨与中国可谓血脉相连，这种紧密的联系必然对华文传媒产生深深的影响。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频繁交流，中国因素从另外一个侧面影响着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

3、从东南亚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

东南亚华文传媒既是作为华侨华人的新闻传媒存在的，同时又是作为东南亚地区的新闻传媒存在的，因而深受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一方面，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对华人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自然在东南亚华文传媒的需求、内容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等体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巨大力量和华文传媒的重要影响，东南亚各国都对华文传媒予以高度的重视，华文传媒政策也随着局势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事实上，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采取的华文传媒政策是有所差

别的，而华文传媒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兴衰。

从更大的角度看，无论中国、东南亚还是华侨华人都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一部分。自从西方国家用炮舰政策打开东方的大门之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朝贡体系就开始土崩瓦解，双双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中，国际关系任何大的变动都会对中国和东南亚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东南亚，由于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自身的力量却薄弱而分散，因此长期以来都是任由大国宰割的对象，从殖民统治的对象到东西方对抗的前沿，东南亚无不受国际形势所左右。就东南亚华侨华人来说，他们的迁移和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扩张的结果，而浓厚的跨国性特征加深了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外关系的联系，东南亚华文传媒作为这种联系在新闻传媒上的反映，也就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动波浪起伏。

在国际政治层面，国际关系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局势对东南亚和中国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华文传媒发展的社会背景；二是国际局势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影响使华侨华人密切关注国际新闻信息，从而促进了华文传媒的发展；三是东南亚各国必然会随国际局势的变化而调整其华文传媒政策。从国际经济的层面看，国际间的经济交流一方面产生了信息交流的需要，华文作为重要的国际商用语言自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华文传媒就成为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国际间的经济交流又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华侨华人的生活和文化水平，扩大了华文传媒的受众基础和影响范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华文传媒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在华侨传媒时期，华文传媒属中国新闻传媒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新闻传媒事业的跨国发展，属于国际意识形态；而在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时期，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华人传媒也受到深深的影响。

总而言之，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是由其特有的传媒形态、东南亚华侨华人特殊的遭遇以及特定的国际关系和地区局势变化所决定的。作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新闻传媒，东南亚华文传媒兼具有浓厚的跨国性特征和强大的社会功能，也正是以这种状态，东南亚华文传媒在近两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变迁中，走过了兴衰相错的发展历程。

在对东南亚传媒作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将把上述的影响东南亚华文传

媒的因素贯穿在受众、传媒性质、中国因素、东南亚局势、国际环境等五个方面之中进行论述。受众因素主要讨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数量、经济水平以及华文教育水平对华文传媒的影响；传媒性质主要从传媒倾向性的角度分析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中国因素主要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及中国与华侨华人的关系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影响；东南亚局势主要讨论东南亚各国局势及华文政策对华文传媒的影响；国际环境则从国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国际关系层面讨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变迁。文章最后从上述因素的综合分析出发，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前景和发展方向进行展望，认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前景光明，但发展的形态将发生变化。

第二章 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兴衰

一、起源

东南亚是海外华文传媒的发源地，东南亚早期的华文传媒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1807年，为了适应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的需要，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布道会派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传教，并计划在澳门或广州建立基督教（新教）中文出版机构，但由于清政府严禁外国人在华传教和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殖民者的敌视，马礼逊举步维艰。1813年，伦敦布道会派传教士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来华协助马礼逊。为避免官府的稽查，马礼逊派米怜及两名刻印技工梁发（又名亚发）和蔡阿国（又名蔡高）前往东南亚华侨的聚居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编印中文宗教刊物。1815年8月5日，由米怜主编的世界上第一份海外华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出版发行，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份近代华文刊物。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中国线装书版式，每月出版1期，从创刊至1821年秋因米怜病重而停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出版时间达7年之久，初印500册，不久增至1000册，最盛时达到2000册。该刊主要流传于中国南部地区和东南亚，内容主要是宗教，也刊登伦理道德、科学知识、政治时事等方面的文章。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出版发行，开创了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对中国近代报刊及海外华文传媒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冲破了清朝的言禁，开启了言论自由之潮流，为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思想和风气，对中国及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停刊后不久，东南亚又先后出现了3份由西方传教士创办和主编的华文刊物，分别是1823年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出版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1827年在马六甲出版的《天下新闻》，以及1837年在新加坡复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1833年在广州出版发行，因清政府政局动荡和禁教政策于1835年停刊）。不过，这3份报刊的发行时间都不长，前者3年，后两者仅1年。此外，还有1份1858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华文周报《日升报》。

东南亚华侨创办的华文传媒则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

解除了华工出国的禁令，致使东南亚的华侨迅速增加，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叻报》的创办人薛有礼就是其中之一），从而为华文报刊的出版提供了读者和物质基础。而华侨的聚居地新加坡也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转口贸易港，中西交往日趋频繁，这就需要交流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在这种背景下，薛有礼于 1881 年 12 月 10 日在新加坡创办了《叻报》。《叻报》初期版式是直排的，内容包括社论、国内外新闻、政府公报和广告等。《叻报》是东南亚地区第一份华文日报，也是当时发行时间最长的华文日报（一直出版到 1932 年，时间长达 51 年），号称“南洋第一报”，长期担任《叻报》主笔的叶季允则被誉为“南洋第一报人”。《叻报》之后，东南亚华文传媒逐步得到发展，1888 年，菲律宾第一份华文报纸《华报》诞生，1890 年，新加坡的《星报》和菲律宾的《岷报》相继出版发行。不过，由于当时的华侨中识字者少，读报人寥寥无几，登广告者更少，这些华文报刊除《叻报》外出版时间都不长，长则几年，短则数月。

二、发展

东南亚华文传媒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时期，分别是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时期、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和二战结束到 50 年代后期，这些时期华文传媒的形态主要是华文报刊。

1、两派论战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时间大致是 1895 年到 1919 年。

1894 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1895 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发动“公车上书”，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受此影响，东南亚华侨先后创办了《檳城新报》（1895 年）、《广时务报》（1897 年）、《天南新报》等支持维新运动。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等维新派人流亡东南亚，积极向华侨社会宣扬君主立宪思想，掀起了东南亚华侨办报的高潮。这一时期创办的维新保皇派的报纸除上述 3 家外，还有新加坡的《日新报》，菲律宾的《益友新报》，缅甸的《仰光新报》、《商务报》，暹罗（泰国）的《启南日报》、《中华日报》，印

尼的《苏岛日报》等。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东南亚华侨中的影响也不断扩大。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革命派创办了一系列的报纸，主要有暹罗的《华暹新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缅甸的《光华日报》、《进化报》，马来亚的《光华日报》，菲律宾的《公理报》，印尼的《泗滨日报》等，并与保皇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革命还是保皇；②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③是否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均地权。由于保皇派报纸较早出版发行，收到先声夺人之效，20世纪初在海外华侨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革命派报纸则是在与保皇派的论战中不断壮大的，通过论战，革命派的主张得到广大华侨的拥护和支持，一些保皇派报纸最后也倒戈易帜，投入革命阵营，革命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些报纸的创办和出版，极大地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传播了进步思想，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两派论战使东南亚华文传媒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不过，由于这些报纸以政治论战为主，不刊登或很少刊登广告，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因而很多是不定期出版的，有些还经常脱期或中途停刊，辛亥革命后，无论是保皇派报纸还是革命派报纸，大多数都相继停刊了。

除上述政治性报纸之外，这一时期东南亚也有一些商业性报刊和中立性质的报刊出版，如印尼的《译报》，菲律宾的《警铎新闻》，越南的《大越新报》等。华文报刊的形式也逐渐向现代型报刊过渡，报纸以铅印的大开张日报为主，实行分栏编排和大字标题，期刊开始采用中国线装书形式。

2、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殖民地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华侨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侨民的文化水平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受国内局势的变动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东南亚华侨的办报热情持续高涨，在这种形势下，东南亚兴起了新一轮创办华文报刊的高潮。新加坡逐渐成为东南亚华文出版业的中心，檳城、曼谷、仰光、巴达维亚、西贡等地的华文报刊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新闻快捷、内容丰富、版面新颖的华文报刊，影响较大有新加坡的《南

洋商报》、《星洲日报》，檳城的《华侨日报》、《南洋时报》，印尼的《新报》（华文版）、《天声日报》，泰国的《国民日报》、《华侨日报》，菲律宾的《平民日报》、《华侨商报》、《新闽日报》，缅甸的《仰光日报》、《缅甸晨报》、《兴商日报》，越南的《华侨日报》、《中国日报》，等等。这其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

《南洋商报》由著名侨领陈嘉庚 1923 年创办，后因经济危机的爆发于 1933 年转手给李光前家族，1938 年收购《新国民日报》，改组为“南洋报业有限公司”；《星洲日报》由华侨实业家胡文虎 1929 年创办，后与同为胡文虎创办的《星中日报》（新加坡）、《星报》（檳城）、《星光日报》（厦门）、《星华日报》（汕头）等一起，于 1941 年在新加坡成立了星系报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华侨报业史上唯一的跨国报业集团。《南洋商报》和星系报业集团都实行商业化经营，聘请著名文化人主持笔政，并率先使用了照片传真、铸字机、轮转印刷机等先进技术，做到新闻快捷、内容丰富、副刊出色，深受读者欢迎。截至 1983 年合刊发行，《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一直是海外最有影响的两家华文日报。

从内容上看，国内局势仍然是这一时期东南亚华文传媒关注的焦点之一，“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等国内重大事件均为东南亚华文报刊广为报道，同时受国内政局、尤其是国共相争的影响，东南亚华文报刊出现了新的对立和争论。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华文传媒不断增加对当地华侨社会的关注，政治色彩有所淡化，逐渐朝文化性、商业性方向发展。

此外，一些华文报刊加强了对东南亚的研究，如《南洋商报》从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辟了“南洋研究”专栏，《星洲日报》于 1938 年起开辟了“南洋研究”专栏，泰国的《中原报》则设有《泰国研究》学术性副刊。1939 年，《南洋商报》出版了反映东南亚人文史地、华侨社会及学术论著的《南洋年鉴》，《星洲日报》则于 1940 年出版了《星洲十年》，这两部著作都是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特别是华侨史的重要文献。

除华文日报外，华文晚报、多日刊、杂志及各式各样的“小报”等刊物也不断涌现，华语广播电台也于 1937 年在马来亚正式开播。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难当头之际，东南亚各华文报刊抛弃了原有的歧见，共同为抗日救国

大声疾呼，一批为声援抗战的报刊也纷纷出版发行，东南亚华文报刊呈现出蓬勃发展和空前团结的局面。据统计，到 1941 年 12 月，东南亚华文报刊的总数达 120 多家，^[1]其中新加坡和马来亚是抗日宣传最为活跃的地区。在新加坡，为了满足读者关心时局的需要，各报均改出早、晚两版（午报《星中日报》除外）；在马来亚，除原有报刊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外，还出现了一批专为报道抗战信息创办的报刊，如檳城的《电讯新闻》，古晋的《古晋新闻日刊》和《沙捞越日报》，诗巫的《诗巫新闻日刊》等。菲律宾、缅甸、越南、泰国等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了大批华文报刊进行抗日宣传。为了应对泰国亲日政府迫害抗日报刊的政策，泰国还一度出现了“姊妹报”的现象，即一家报纸以两家或三家不同的报名注册，以便报纸被查封后立刻以另一报名继续出版。这些报刊积极揭露日寇暴行，批评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态度，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呼吁国际友邦制裁日本，鼓励侨胞捐款捐物、回国参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东南亚，除泰国的《泰华商报》利用特殊的关系和巧妙的手段得以公开出版外，东南亚的其他华文传媒均被关闭，许多新闻工作者也惨遭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华文传媒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抗日宣传。

值得一提的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 20 年间，东南亚华文报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多数报刊已具有现代报刊的规模。各大华文日报多为对开张，主要报纸日出 2-3 大张，后来有的增至 5-6 大张。各大报纸均设有各类副刊，并颇为重视。

3、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华文传媒恢复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日占时期被迫停刊的报刊纷纷复版，新的报刊也不断出现，其品种之多、发行量之大、分布之广均属空前，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据统计，从 1945 年 8 月至 1959 年底，东南亚国家发行的华文报刊有 340 种（报纸 159 种，期刊 181 种），约占海外华文报刊总数的 80%。^[2]战后复刊的重要报刊有新加坡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马来亚

的《星报日报》、《光华日报》、《现代日报》，沙巴的《华侨日报》，菲律宾的《公理报》、《华侨商报》、《新闻日报》，印尼的《新报》、《天声日报》、《大公报》，泰国的《中原报》，缅甸的《国民日报》、《觉民日报》，越南的《远东日报》、《越南日报》等。新创办的报刊更多，据不完全统计，从日本宣布投降后到 1946 年底的 16 个月中，东南亚地区新创办的华文报刊就达 230 多种，^[3]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份新的华文报刊出版发行。新办的报纸中较有影响的有新加坡的《南侨日报》、《中南日报》，马来亚的《中国报》、《马来亚通报》，沙捞越的《诗华日报》、《美里日报》，沙巴的《山打根日报》，印尼的《生活报》、《自由报》，泰国的《光华报》、《全民报》、《华侨日报》、《星暹日报》，缅甸的《人民报》、《中国日报》、《新仰光报》，越南的《妇女日报》、《中国日报》等。不过，由于政治、经济及局势变化等多方面因素，这一时期新办的报刊寿命都不长，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

由于创办的动机和背景各异，这一时期东南亚华文报刊依然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有拥护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如新加坡的《南侨日报》，马来亚的《现代日报》、《民声报》，印尼的《新报》、《生活报》，泰国的《全民报》、《真话报》，菲律宾的《华侨商报》，缅甸的《人民报》、《新仰光报》，越南的《越南日报》等；有反共亲国民党的，如新加坡的《中南日报》，印尼的《天声日报》、《自由报》，菲律宾的《公理报》，缅甸的《国民日报》、《中国日报》等；还有很多是持中立立场的，这类报纸大都以商业报的形式出现，较注重当地的华侨社会，对国共双方则持不公开支持或反对任何一方的立场。

这一时期东南亚的华语广播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英国海外传播公司在东南亚创办的“丽的呼声”有线广播电台华语节目相继在新加坡、马来亚、泰国等地启播，越南“南方之声”华语广播节目也于 1950 年 7 月创办。

不过，这一时期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由于一些东南亚国家国内的局势动荡和政策多变，许多华文报刊的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批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报刊被查封，许多爱国华侨报人受到迫害。即使那些没有查封华文报刊的国家，在反共排华气氛的笼罩下，华文报刊也不得不小心行事。

三、转型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东南亚各国局势和政策的变动以及华侨向华人身份的过渡，东南亚华文传媒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传统的华侨传媒向华人传媒转变，并在总体上由鼎盛转向衰落。

1、从华侨传媒转向华人传媒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各国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外侨问题，尤其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1955 年，中国与印尼签署协议，规定华侨只能选择其中一国的国籍，尔后，中国政府按此原则解决其他国家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华侨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大多选择了居住国国籍，这样，华侨就变成了华人，华侨社会迅速向华人社会过渡。与此相适应，东南亚华文传媒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华侨传媒向华人传媒转变。另一方面，在允许华文报刊出版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也明文规定不准外国人办报，华侨报刊已不复存在。

随着东南亚华文传媒性质的变化，其职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侧重于向华人灌输居住国的“国民意识”，介绍居住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及各种政策法规，以协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华文报刊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表现为政治性的内容减少，商业性的新闻增加，关注的焦点从中国转向当地，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和评论大为减少。这一时期，大多数的东南亚华文报刊都把中国新闻放在“国际新闻”、“东亚新闻”版中，或分别放在“综合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等版面上，而不另设中国版。

与这一重大转变相伴随的是双语报刊的出现。由于战后很少新移民迁入东南亚，当地华文报刊的读者主要以当地出生的华裔为主，而第二、三代的华裔懂中文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华文报刊推出了双语版，如印尼的《社会报》（中印双语），菲律宾的《晨报》（中英双语）。

华侨报刊向华人报刊的转化，使华文报刊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和言论出版自由，改变了侨报时期动辄被当局查封的状况，并因此得到了较为稳定的发展。当然，这仅限于少数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多数的东南亚国家则由于政局的变动以及反共排华浪潮的兴起，采取了限制华文报刊的政策。

2、从鼎盛转向衰落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起，东南亚华文传媒逐渐从鼎盛走向衰落。据统计，1970 年至 1979 年，东南亚国家发行的华文报刊为 232 种（报纸 75 种，期刊 157 种），比 1959 年的 340 种少 108 种，占海外华文报刊总数的份额也从 80% 降至 55%。^[4]

东南亚华文传媒由盛转衰，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新办的报纸仓促上阵，缺乏应有的出版条件，加上华文报刊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因而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由于受独立后政权更替频繁和国际上反共排华浪潮的影响，多数东南亚政权都采取限制华文传媒的政策，一些国家甚至查封和禁止华文传媒的创办发行。在印尼，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起华文报刊就受到压制，1965 年“九·三〇”事件发生后，印尼政府关闭了所有华文报刊，只是为了加强与不懂印尼语的华人联系，印尼官方于 1966 年 9 月出版了印华双语的《印度尼西亚日报》，这是苏哈托时代唯一的华文报刊。在泰国，50 年代后就采取了排斥和歧视华侨的政策，限制华文教育，禁止新的华文报刊出版，加上军事政变频频，华文传媒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直至 70 年代才有所好转。在菲律宾，1972 年马科斯政府实行军事戒严后，曾一度关闭所有的华文报刊。在缅甸，1966 年军政府关闭了所有外侨报纸，华文报刊在缅甸绝迹。在印度支那，1975 年越南统一后，由于越南当局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印支的华文报刊除越南的《西贡解放报》华文版外，全部被停刊。

不过，这一时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传媒却免遭厄运，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在新加坡，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各种报刊有数十种，其中 1967 年创办的《新明日报》得到迅速的发展，短短的 5 年内有新马地区的销量就突破 15 万份，与《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广播电视方面，新加坡 1965 年建国后成立了新加坡广播电视台，播放 4 种官方语言和 6 种华语方言节目。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新闻业的管理，规定报业公司的董事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报业公司必须出售股份，个人拥有的股份不得超过 3% 等，从此，诸如《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家族企业就变成了公众公司。在马来西亚，虽然一些华文报刊被关闭或因经营不善而停刊，但也有新的报刊出现，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期，新出版的报刊约

有三四十种，如《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的马来西亚版，《国际时报》，《马来西亚日报》，《新生活报》等，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南洋商报》。马来西亚的华语广播电视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四、复苏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逐步得到改善，东南亚国家的局势也趋于稳定，一些国家因此逐步放宽了对华文传媒的限制，东南亚华文传媒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南亚华文传媒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文传媒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印尼及印支各国的华文传媒则一解长年之禁，得到迅速的复苏。以下是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华文传媒发展的简要情况：

1、新加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的华文报刊多次进行整合。1982年，新加坡政府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为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次年合刊为《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1984年，在政府的鼓动下，当时并存的三家出版公司——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海峡时报有限公司及时报出版有限公司联合组成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这是新加坡最大的出版机构，政府拥有全部股份的60%。所属的华文报纸有《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星期5周报》，这也是目前新加坡主要的华文报纸。虽然新加坡华文报的种类减少了，发行量却得到增加，据统计，1995年《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日均销量之和为45万份，较合并前增加了34%。《联合早报》是发行量最大的海外华文日报，除在新加坡发行外，还远销其他东南亚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

在广播电视方面，1982年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分离，重新组建5个广播网，其中第3套为华语台；2个电视频道则交叉播出英、华、马来和泰米尔4种语言，华语节目约占四分之一。1994年，新加坡广播电视全面私有化，全国的广播电台全部归属于新加坡国际传媒集团，从1996年5月起，新加坡国际传媒集团属下的广播机构和电视机构每天用4种官方语言和6种华语方言播放各类节目。1997年7月，新加坡政府还批准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创办电视台，2000年

5月6日，其中文电视频道正式开播。

2、马来西亚

由于马来西亚当局推行马来文优先的政策及经济的不景气，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的发展较为缓慢，华文日报的数量也有所减少。据统计，1998年，全马的华文日报共18家，是海外拥有华文日报最多的国家。南洋报社集团属下的《南洋商报》（原《南洋商报》马来西亚版）和朝日报业集团的《星洲日报》（原《星洲日报》马来西亚版）、《光华日报》是主要的华文报；张晓卿的朝日报业集团则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报业集团，其报刊发行量约占全马华文报刊发行量的70%。与华文日报的数量减少相反，这一时期马来西亚的华文多日刊报纸和期刊却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全马有华文多日刊报纸8家，期刊63种；华文报刊的读者也有所增加，18家华文日报的日销量远超过马来文报和英文报，在星期天，全马的华文报总销量近100万份。^[5]

另外，马来西亚的华语广播电视逐渐得到扩展，到90年代，马来西亚的6套广播节目中4套有华语广播，3个电视频道则在每天下午6至7点的时段播放华语节目，节目主要是由香港提供的粤语节目。

3、泰国

20世纪70年代初起，中泰两国的关系开始改善，泰国的华文传媒政策逐渐放宽，华文报刊因此得以复刊或创办，1976年泰国发生政变，他宁政府关闭了除《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京华日报》外的华文报刊，不过，1977年他宁下台后，其他华文报刊又得以复刊。80年代后又出版了《中原日报》、《工商日报》、《中商日报》。目前，泰国的华文日报主要有《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京华中原联合日报》、《中华日报》、《新中原报》和《亚洲日报》等6家，华文期刊则以《时代论坛》（双月刊）、《时代周刊》和《现代泰国导报》较受人瞩目。

4、菲律宾

1972年，马科斯政府关闭了所有的华文报刊。1973年，《公理报》和《大中华日报》获特许合并组成《联合日报》，成为当时全菲唯一的一份华文报纸。1986年阿基诺总统执政后，菲律宾的华文政策较为宽松，陆续有华文报纸创刊或复刊，目前出版的华文日报有《商报》、《世界日报》、《联合日报》、《菲华日报》等4家。电视方面，“福华有线中文电视服务”于1987年1月启播，每天用闽南话、

广州话和普通话播出 7.5 小时。

5、印度尼西亚

瓦希德当选印尼总统后，大幅度调整了华文政策，使禁止出版 30 多年的华文传媒迅速复苏。2000 年 11 月，用印尼语、英语和汉语进行播音的资讯电视台“地铁电视台”开播；2001 年 3 月，万隆一华语广播电台开播。报纸杂志更是如雨后春笋，报纸有雅加达的《世界日报》、《印度尼西亚商报》、《和平日报》、《新生日报》、《国际日报》，泗水的《千岛日报》、《龙阳日报》、《诚报》，棉兰的《印广日报》、《华商报》，西加里曼丹的《坤甸日报》等 11 家；杂志有《印尼与东协》、《群岛月刊》、《南风》等。

6、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这几个华文报刊已经绝迹的国家，华文报刊又开始出现。1993 年 4 月，《越南经济新闻》在胡志明市创办；同年底，柬政府同时批准了《高棉独立日报》、《华商日报》、《金边时报》出版；1996 年，《柬华日报》在金边创刊；1998 年 11 月，《缅甸华报》在仰光出版。

从形式上看，新时期东南亚的华文报纸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部分报纸采用当地通用的简化字横排外，其他多数采用繁体字直排，版式对开为主，每天出四个到四五十个版不等。从内容上看，以当地的华社新闻及国内新闻为主，强调为当地华人服务，传承中华文化；中国新闻一般放在国际新闻中，而且基本上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报道和评论。不过，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东南亚的华人越来越关心中国的情况，华文传媒因此不断增加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

另外，随着电脑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东南亚的华文电子报刊也得到迅速的发展。1995 年 8 月，《联合早报》开办电子版，成为东南亚第一家上网的华文报，此后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也分别开办电子版，其他各式各样的电子网站更是难以计数。电子报刊的推出受到了华文读者的欢迎，《联合早报》上网的当月，浏览的次数即达 25 万；《南洋商报》电子版推出的半年内，读者也接近 200 万人次。1997 年 5 月，《联合早报》电子版进行改版，新版图文并茂，简洁明快，信息丰富，深受读者欢迎，改版当月读者即达 417 万人次，现已成为

世界上主要的华文电子报之一。

近年来东南亚的华文传媒虽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也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困难，比如华文读者后继乏人的问题，由于多数东南亚国家长期实行禁止或限制华文教育的政策，年轻一代的华人懂华文者不是很多；又比如华文传媒的言论限制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民族问题，东南亚国家对华文传媒的言论控制依然十分严格，这影响了华文传媒的进一步发展；还有传媒人才缺乏的问题，在印尼、缅甸等华文传媒断层多年的国家，华文传媒人才断层严重，这影响了华文传媒的质量；诸如此类。

第三章 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因素

一、受众因素

传媒受众是指新闻传播信息的接受者，通俗地讲，就是报刊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视的观众以及网络的网民。任何传媒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且能够接受和理解传媒信息的受众。就东南亚华文传媒来说，受众主要受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人口数量、华文水平、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1、华侨华人的人口数量

在东南亚，由于其他民族不懂或者很少使用华文华语，华文传媒的受众主要是华侨华人，一定数量的华侨华人就成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人口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移民，二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从历史上看，虽然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古已有之，但在西人东来之前，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数量并不多，约 10 万人，^[6]主要是一些从事官方朝贡贸易和民间海外贸易的商人及其后裔。西人东来之后，东南亚华人移民开始大幅增加，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的开发需要大量的熟练手工业者；另一方面，中国沿海地区（主要是闽粤沿海）的人口压力和社会动荡迫使大量居民海外谋生。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潮流 19 世纪中叶清政府海禁政策解除后逐渐达到高峰，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据庄国土教授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一书中估算，鸦片战争前夕，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总数约在 150 万人左右，其中暹罗华侨华人占 60%；^[7]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 510 万，主要分布在暹罗、马来亚、印尼等地。^[8]而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东南亚华侨华人已达 1016.5 万人。^[9]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成倍增加，中国南部沿海居民的南迁是重要原因。

东南亚国家独立后，各国都采取了禁止中国人移入的政策，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潮流终止。与此同时，部分华侨华人开始迁离东南亚，返回中国或迁西方国家。不过，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侨选择留在当地，加入当地国籍，因此东南亚华

人的数量并没有大幅下降；相反，由于强劲的人口自然增长，东南亚华人数量持续增加，据统计，2002年东南亚华人总人数已达2700多万人。^[10]另外，近年来东南亚各国放宽了华人移民的政策，允许部分技术和投资移民入境，不过，从总的来说数目并不大。

东南亚庞大的华侨华人数量奠定了华文传媒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虽然由于政局的变动和华文政策的变化导致东南亚华文传媒历经波折，但是拥有广大受众的东南亚华文传媒往往在政局平稳和政策宽松之后能够重新复苏，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

2、华侨华人的华文水平

华文水平包括华文的听说水平和阅读水平，这是受众接受和理解华文传媒的保证。具体说来，就是华文报刊的读者必须具备阅读华文的能力，广播电视的听（观）众必须能够听说华语。

从总体上讲，东南亚华文传媒受众的华文水平取决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水平。就华文报刊来说，由于移入东南亚的中国沿海居民大多是没有接受教育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识字水平普遍低下，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华文阅读能力受制于当地华文教育的水平。而就东南亚华语广播和电视来说，由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东南亚各国普遍对华文教育采取了限制政策，一些国家如印尼甚至彻底取缔了华文教育，禁止在公开场合使用华文，致使许多在这一时期出生或成长的东南亚华人丧失了华语听说能力，严重制约了东南亚华语广播和电视的发展和普及。

东南亚华文教育兴起于20世纪初，在当地华侨和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东南亚华文教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步入繁荣期。后来由于殖民政府的压制特别是日本对东南亚的侵占，东南亚华文教育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华文教育得到迅速的恢复，步入鼎盛时期。进入60年代后，由于东南亚华侨社会的转型和对华文教育的限制，东南亚华文教育迅速走向衰落。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和华文政策的放松，东南亚华文教育又得到迅速的复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与东南亚华文传媒一样，也经历了兴

衰相错的发展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事实上，十九世纪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缓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华文教育的缺乏；而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亚华文传媒的繁荣，也正是得益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兴起；近年来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复苏，也同样与华文教育密切相关。

3、华侨华人的经济水平

显而易见，华侨华人的经济水平对华文传媒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各种生产和生活信息交流的需要，从而产生了对华文传媒的需求，这就为华文传媒提供了销售市场；另一方面，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华商经济实力的增长，为华文传媒的出版发行奠定了物质基础。这在以工商业为主导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体现得尤为明显。

长期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都是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在朝贡贸易时代，东南亚华侨华人主要从事官方的朝贡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并逐渐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华商网络。西人东来之后，虽然华商丧失了远东海上贸易的主导地位，但由此而来的东西方直接贸易和东南亚的开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这吸引了大量契约华工的南迁，华商网络也不断得到扩展和壮大，华侨华人的聚居地马六甲、巴达维亚、马尼拉等则发展成为国际或地区的商贸中心，华侨华人经济也在东南亚占有重要的位置。东南亚各国独立后，东南亚华侨社会经历了向华人社会的痛苦转型，加上部分国家对华人经济采取了压制政策，东南亚华人经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低迷，但随着东南亚各国工业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东南亚华人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济实力大增强，已经成为各国的经济支柱之一，而其经营范围，仍然集中在工商业领域。

这种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对传媒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商业交往的频密性突显了信息交流的重要；另一方面，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聚效应，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人口都比较集中，这为传媒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受众基础。事实上，东南亚华侨华人绝大多数都居住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里面，尤其是国际大都市里，如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曼谷、马尼拉等。而这些大都市，也是华文传媒最发达的地区。

综上所述，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人口、华文水平和经济水平构成了华文传媒受众因素的主要方面。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随着东南亚各国与华侨华人世界的频繁交流和华文实用价值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其他各族人开始学习华文和接触华文传媒。不过，由于东南亚华人的人口众多以及华人与华文的天然联系，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受众结构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二、传媒性质

从性质上看，东南亚华文传媒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华侨传媒还是华人传媒，二是政治性传媒还是商业性传媒。这些性质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华文传媒的形式到所传递的内容，从所产生的影响到当地的传媒政策，东南亚华文传媒各个方面都深受传媒性质的影响。

1、从华侨传媒/华人传媒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

先从华侨传媒的角度看，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转型之前，东南亚华文传媒可以说都是典型的侨民传媒，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媒的受众是东南亚华侨，他们具有中国国籍，视中国为祖国，并持叶落归根的思想，而只把东南亚看作是谋生地；

(2) 华侨传媒在政治上效忠中国，甚至视中国政府为最高领导，而中国政府及各派政治力量也对华侨传媒进行资助和管理；

(3) 华侨传媒的形式与中国国内传媒无异，内容也以中国国内的消息为主。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华侨传媒可以被视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海外的延伸。华侨传媒的性质，一方面使东南亚华文传媒受中国国内形势所推动，在侨报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引起侨居国政府和其他民族的猜疑，被认为是其主权独立、政治稳定乃至民族团结的威胁，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 20 世纪，因而常常受当地政府的压制。事实上，即使在东南亚华文传媒的繁荣时期，西方殖民政府也没有停止过对华文传媒的限制，东南亚各国独立之后，对华文传媒进行压制，就更不足为奇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东南亚各国独立

后，华文传媒开始由传统的华侨传媒向当地的华人传媒过渡。

华侨传媒向华人传媒的转变，完全改变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面貌。它不再视中国为祖国，而效忠居住国，并逐渐消除中国国内势力的影响，而以当地华人社会为依托，已经属于当地新闻传播事业的一部分了。在内容上，华人传媒也以反映当地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为主，侧重于向华人灌输居住国的“国民意识”，介绍居住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及各种政策法规，以协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和评论则大为减少，并且不再设中国版。以新加坡《南洋商报》为例，该报有关中国问题的社论 1946 年占社论总数的 69.7%，1950 年下降到 22.5%，1953 年则为 2.4%；而有关新马的社论则逐年增加，1946 年占 19%，到 1959 年已经高达 84%。^[1]

伴随着华侨传媒向华人传媒的过渡，东南亚华文传媒从鼎盛走向衰落。一方面，华人传媒被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使之难以获得必要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都加强了对华文传媒的管制和限制，印尼等国家为了推行强制同化政策，更是完全禁止华文传媒的出版。不过，华人传媒性质的确立，使华文传媒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和言论出版自由，改变了侨报时期动辄被当局查封的状况，这使得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传媒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2、从政治性传媒/商业性传媒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

正如前文所讲，政治性传媒通常是受某种政治集团的资助，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因而主要受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商业性传媒则依托于受众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需要，主要受经济形势的影响。从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历史看，早期的宗教性传媒实际上是为西方殖民者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服务的，应当算是政治性传媒。而在华侨传媒时期，政治性传媒也占有重要地位，其间东南亚华文传媒几次大的发展都与政治性传媒的发展密切相关。东南亚华文传媒的第一次发展高潮主要源于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论战；第二次发展高潮则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共相争和抗日救亡的结果；而战后华文传媒繁荣的政治因素则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新中国的成立，激发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些发展时期，各派政治势力为了争取东南亚华侨的支持，都创办了一系列的政治性报刊，即使是原有

的商业性刊物也深受政治局势的影响，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性。不过，也正是因为政治性传媒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因而很容易被当局所压制；同时由于缺乏商业运作经验，政治性传媒往往难以为继，因此，一旦局势转趋平稳，这些政治性传媒就会停止出版，一些能够继续发行的，也必须向商业性传媒转化。在转型之后，华文政治性传媒在东南亚已难有发展空间，东南亚华文传媒主要是一些商业性传媒，即使一些华文传媒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也只是出于居住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及东南亚局势的稳定，东南亚华文传媒进一步朝商业化方向发展，那种纯粹为政治目的创办华文传媒的现象已经难得一见了。也正因为朝商业化方向发展，东南亚华文传媒改变了受政治局势的影响而兴衰相错的局面，随着东南亚华人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华文价值的上升而获得了稳步的复苏和发展。

三、中国因素

作为华侨华人的新闻传媒，任何海外华文传媒都不可避免地受中国因素的影响。不过，与其他地区的华文传媒相比，东南亚华文传媒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尤其是华侨传媒时期。

如上文所言，在华侨传媒时期，东南亚华文传媒实际上是中国新闻传播的组成部分，因此各个方面都深受中国因素的影响。在传媒的形式上，东南亚华文报刊的版面设计、表达方式乃至字体和印刷都与中国国内传媒一脉相承。在传播的内容上，东南亚华文报刊一直把中国新闻作为关注焦点，除要闻版以中国新闻为主外，往往还设有国内通讯、闽粤新闻以至潮梅新闻等专版，其总量大约占到新闻版面的一半以上；社论也是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在办报的经费上，许多东南亚华文报刊都接受国内政治派别的资助，国民党政府还推行在海外办党报的政策，这一政策甚至一直维持到华文报刊转型之后。而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动也自然对东南亚华文传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关乎中国的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东南亚华文传媒都深深地卷入其中。

事实上，东南亚华侨报刊几次大的发展都源于中国的政治变动。在康有为等

维新派人物流亡之前，东南亚华文报刊的发展缓慢，康有为等人到了东南亚之后，迅速掀起了东南亚华侨办报的高潮；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为了宣扬革命思想，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也在东南亚兴办了一系列的报纸，形成了东南亚华文传媒发展的第一次高潮。“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一批为声援抗战的报刊也纷纷出版发行，东南亚华文报刊呈现出蓬勃发展和空前团结的局面，而捐资筹款、抵制日货、回国参战等则成为当时华文报刊的主要议题。二战结束后，中国的国内战争也深深地影响了东南亚华文传媒，为了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国共两党都加强了对海外华侨的舆论宣传，这使得东南亚华文传媒重新出现分裂和争论，不过，这些分裂和争论也进一步促进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繁荣。

东南亚华文传媒与中国的这种紧密的联系，是其他地区的华文传媒难以比拟的。这与东南亚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及特殊的东南亚华侨社会形态是分不开的：首先是东南亚与中国毗邻的地理位置，这一方面为中国与东南亚华侨之间的交流及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的局势必然对邻近的东南亚地区局势产生影响，因而东南亚华文传媒必然受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局势的影响；其次是东南亚华侨巨大的人口数量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必然成为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目标，华文传媒自然就成为政治角力的工具；其三是东南亚华侨对中国的认同，独特的、自成一体的华侨社会体系使东南亚华侨保持了完整的华人特征，因而在身份转型之前，一直视中国为祖国，而把东南亚看作是谋生地，因而更关心中国国内的风云变幻；其四是东南亚的殖民历史，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一方面导致东南亚华侨没有形成对当地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又为东南亚华侨社会的自由发展及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这加深了中国对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影响；诸如此类。

事实上，正是由于东南亚华人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及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迫使东南亚各国采取各种措施对其加以限制，因而在国家独立之后，各国政府就着手解决外侨问题，转变华侨的身份和国家认同，削减中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华侨传媒就转型为华人传媒，与此相对应，东南亚华文传媒与中国的各种联系迅速地被削弱了。而到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反共排华的浪潮和国内政局的变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对华文传媒进行限制，加上中国正处于文革动乱，就更谈不上中国对华文传媒的影响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得到迅速的改善和发展，相互的交流也日趋频繁，这些交流尤其是经济上的交流提升了华文的实用价值，从而政治色彩淡化、商业化趋势明显的东南亚华族传媒提供了复苏和发展的基础。中国因素从另外一个侧面促进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

四、东南亚局势

东南亚的局势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华侨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华文传媒自不例外。在经济上，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水平与东南亚经济息息相关，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为华文传媒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政治上，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对各国的华文传媒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在东南亚各国华文传媒政策的变化和差异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西方殖民时代，东南亚的局势较为稳定，华侨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稳步的提高，殖民者的华侨政策也较为宽松。华文传媒方面，虽然殖民者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限制，但与后期的日本侵略者及多数的东南亚国家的政策相比，要宽松很多，华文传媒因此获得了稳定的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东南亚，推行严厉的华文政策，东南亚华文传媒除泰国的《泰华商报》外，均被关闭，许多新闻工作者也惨遭迫害，东南亚华文传媒不得不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抗日宣传。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一方面使得东南亚的各种政治势力无暇顾及华文传媒，另一方面又使东南亚华侨华人倍加关心时局的变化，从而使东南亚华文传媒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各国的局势产生了不同的变化，因而导致了不同的华文传媒政策，各国的华文传媒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多数的东南亚国家都对华文传媒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甚至一度查封或禁止华文传媒的发行，这是东南亚华文传媒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在泰国，20世纪50年代后就采取了排斥和歧视华人的政策，禁止新的华文报刊出版，加上军事政变频频，华文传媒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上台后关闭了所有的华文报刊，仅由官方出版了印华双语的《印度尼西亚日报》；在菲律宾，华文传媒也一度遭到马科斯政府的关闭；缅甸军政府则于1966年关闭了所有外侨报纸；印度支那则由于越

南 1975 年统一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华文报刊全部被停刊，仅剩越南的《西贡解放报》华文版。不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华文传媒在转型之后，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和言论出版自由，因而得到了较为稳定的发展，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有数十种华文报刊出版，华语广播电视也逐步得到普及和发展。

进入八十年代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各国的局势趋于缓和与稳定，多元文化论流行，政治上也逐渐走向民主和包容，与此相适应，东南亚各国对华文传媒的限制逐渐消除。这使东南亚华文传媒得到全面而迅速的复苏，华文传媒几近绝迹的印尼、缅甸和印支各国的华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印尼还出现了华语电台和电视节目；长期发展缓慢的泰国和菲律宾的华文传媒也得到了稳定的发展；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传媒则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除了报刊、电视和电台之外，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和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还相继推出了电子版，深受华文读者的欢迎。其他各式各样的电子网站也在东南亚各地涌现，华文电子报刊的出现，标志着东南亚的华文资讯进入全球共享时代。

五、国际环境

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是一个纵横交错、相互联系和自我调节的社会系统，而以欧洲为中心的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早在 16 世纪就开始形成，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覆盖了全世界。虽然这一理论存在诸多的争议，但是自从西方国家用炮舰政策打开东方的大门之后，西方殖民体系逐渐取代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朝贡体系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和东南亚逐渐纳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中，因而深受国际关系变动的影响。就东南亚华文传媒来讲，从其 19 世纪初诞生之日起就处于这一国际关系体系之中，而浓厚的跨国性特征则进一步加深了国际关系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影响。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东南亚因为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直是国际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这一方面使得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命运与国际局势息息相关，因而需要了解国际局势的相关信息，从而促进了华文传媒的发展；

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必然会随国际局势的变化而调整其华文传媒政策。国际政治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影响在“二战”期间及战后东西方对峙时期表现得尤其突出。“二战”期间，由于日本的高压政策，不但日占区禁止华文传媒出版，东南亚非日占区如泰国迫于形势也实行同样的政策。战后，东南亚处于东西方对抗的前沿，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更为激烈，政权更替频繁，不同政治倾向的当政者通常实行不同的华文传媒政策，共产党或亲共产党的政权如印尼的苏加诺政府往往对亲国民党的华文传媒进行压制，而对拥护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华文传媒持宽容态度，其他亲西方的政权则相反。后来，受国际上反共排华浪潮的影响，东南亚国家普遍对华文传媒采取了限制政策，即使在华人当政的新加坡，也加强了对华文传媒的控制。进入 20 世纪八十年代后，国际局势趋于缓和，苏东的解体则结束了东西方的对抗，这为东南亚局势的缓和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正常化提供了条件，东南亚华文传媒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

从国际经济的角度看，国际间的经济交流一方面产生了信息交流的需要，华文作为重要的国际商用语言自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华文传媒就成为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国际间的经济交流又导致了国家间的经济相互影响，从而对华侨华人的生活和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早期的由东南亚华侨创办的华文报刊正是在中西方贸易日趋频繁的背景下出版的，而创办地正是东南亚最大的转口贸易港新加坡，新加坡也由此成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中心。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国际间的经济往来空前活跃，这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尼，由于长期的华文限制，造成严重的华文人才断层，难以适应国际经济交往的需要，因而一改往日的限制政策，甚至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推动华文传媒和华文教育的发展。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华文传媒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深受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意识形态的斗争使东南亚华文传媒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竞相争夺的对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华人的政治热情，因而促进了华文传媒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华文逐渐被视为社会主义语言，传统的、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东南亚华侨传媒自然就与共产主义的传播联系起来，因而受到反华反共势力的压制。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争淡化，东南亚华文传媒商业化趋势明显，这使东南亚各国对华文传媒的猜疑逐渐消除。另一方面，多元文化论的流行

则为华文传媒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多元文化论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优点，主张不同文明的共存和发展，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东南亚各国开始重新评价华侨华人及中华文化，肯定华人在东南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多元文化政策也就水到渠成。

六、小结

在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说，除了上述的因素外，传媒的技术、人才及经营管理等方面也起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从技术上看，20世纪新闻传播领域发生几次大的技术革命：一是无线电技术、电波调制技术和图像传输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改进，使广播电视传媒得以诞生和普及；二是计算机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的运用，使广播、电视、报纸的传输速度得到迅速的提高，广播电视得到进一步的普及，覆盖人群逐渐超过了印刷传媒；三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向全新的国际互联网传播方式转变。传媒技术的发明和完善使华文传媒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播方式不断得到转变，传播内容变得丰富多彩，传播速度变得快捷方便。即使是传统的华文报刊，也随着印刷技术和传输技术的发展变得图文并茂、印刷精美，深受读者的欢迎。从人才的角度看，东南亚华文传媒几次大的发展都得益于报业人才和文化名人的南迁，康有为、傅无闷、郁达夫、胡愈之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而近年来复苏的印尼、越南、缅甸等国的华文传媒，却由于长期的华文限制造成了华文传媒人才的短缺，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经营管理方面，早期的华文报刊多属于政治性报刊，经营管理方面都比较薄弱，因此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发行量不大，寿命也不长；而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为代表的华文商业报刊一般都比较注重经营管理，聘请著名文化人主持笔政，并及时更新技术和设备，因此报刊的质量都比较高，规模比较大，并逐渐实现了跨国经营。

以上是对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各个方面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也不是单独产生影响的，而是综合地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这些因素对东南亚华文传媒所起作用 and 影响是不同的。在东南亚华文传媒发展的初

期，华侨华人人口数量和华文教育水平应该是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主要因素；从两派论战时期到战后初期，华文传媒的性质和中国的国内因素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影响更大；在东南亚华文传媒的转型时期以及近年来的复苏时期，东南亚局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动对华文传媒的发展更具决定性意义；而技术、人才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则贯穿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始终。这些因素的变动决定了东南亚华文传媒的跌宕起伏，这就是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兴衰逻辑。

第四章 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前景及趋势

一、前景

近年来,东南亚华文传媒得到了迅速的复苏,各国的华文传媒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对于多灾多难的东南亚华文传媒,人们对其发展前景依然心存疑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从国际关系的层面进行分析,因为在这个交流频繁、日趋一体的全球化时代里,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无论是中国,东南亚,还是华侨华人都深深地融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中,而这些,正是我们分析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基础。

从总的来讲,虽然“冷战”后展现给我们的依然是战火不断、杂乱无章的世界,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了。一方面,迅速增加的共同利益和日趋减少的冲突利益为国际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在经济上,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各国之间互为商品市场,互为投资对象,并由此带来技术、管理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任何国家都难以在世界经济中独善其身,因此,维护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和顺畅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在政治上,各国主权的独立和各民族关系的日趋平等使引发国际冲突的政治根源逐渐消除,与此同时,为了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和解决核武器、国际恐怖主义、环境、跨国犯罪等复杂的全球问题,各国迫切需要加强政治上的合作;意识形态上,社会制度之争不断弱化,多元文化论被普遍接受,国际间已经不再为意识形态争论不休了。另一方面,现行的、无论内容还是功能都不断得到强化的国际机制(包括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及其执行机构——国际组织)为促进国际合作、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行为逐步得到规范,国际社会已经步入制度化的康庄大道,这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不仅为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促进了华人经济的国际交流和发展,为东南亚华文传媒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与此相适应,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受众因素、传媒性质、中国因素、东南亚局势等方面也呈现出有利于华文传媒发展的变化。

受众方面,近年来从中国移入东南亚的华人移民逐渐增加,据估计,移居东

南亚各国的新移民有 50~60 万人左右；^[12]另一方面，近年来东南亚华文教育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华文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应用，因此华文传媒的受众人数将得到增加。

华文传媒的性质方面，东南亚华文传媒已完全转型为居住国的华人传媒，其跨国性特征已经明显淡化，而且正朝着商业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等方向发展，这消除了东南亚各国的疑虑，使华文传媒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和宽松的发展环境。

中国因素方面，中国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政治影响已基本消失，其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商业上，即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贸易的迅速增长极大地提升了华文的商用价值。据统计，自 1990 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以年均约 20% 的速度递增，到 2002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了 548 亿美元，2003 年头 10 个月，双边贸易额更是达到 626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44.1%。^[13]中国与东南亚迅速成为各自的主要贸易伙伴，2002 年 11 月，我国与东盟 10 国在金边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于 2010 年建立中国和东盟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频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必然对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东南亚局势方面，东南亚各国在政治上逐渐民主化，多元文化政策流行，政局趋于平稳；在经济上，东南亚各国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得到稳定的恢复和发展；民族关系也得到改善，传统的华侨社会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华侨都加入了当地国籍，并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全面认同居住国。这些都有利于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东南亚各国都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开放的国际体系之中，而各国曲折的社会发展史表明，也唯有如此，社会经济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总而言之，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各个因素都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东南亚华文传媒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前景光明。当然，受多数东南亚国家长期实行禁止或限制华文传媒政策的影响，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如许多年轻一代的华人不懂华文，华文传媒人才缺乏，等等。此外，东南亚华文传媒还受到原住民传媒和英语传媒的挑战。这些都制约了华文传媒的发展，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趋势

需要说明的，东南亚华文传媒良好的发展前景并不意味着重现传统华侨传媒的辉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东南亚-中国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东南亚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趋势，东南亚华文传媒将呈现出商业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趋势，这也是东南亚华文传媒所应坚持的发展方向。

商业化方面，东南亚华文传媒的政治色彩将进一步淡化，经济和文化色彩更为浓厚。由于国际形势和东南亚局势的缓和及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东南亚华人关注的焦点逐渐从政治方面转移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上，以政治宣传为主的政治性华文传媒已经没有市场，政治势力对华文传媒的介入也明显减少了，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文传媒已经转化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集团。另一方面，东南亚华人经济的发展及中国与东南亚的频繁交流为华文传媒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东南亚华文传媒具有广阔的商业发展空间。此外，近年来，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化重新受到肯定，越来越多的国家鼓励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华文传媒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媒介，因此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

国际化方面，与东南亚及华人社会融入国际社会的趋势相适应，东南亚华文传媒在内容、形式、经营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将呈国际化趋势。在内容上，东南亚华文传媒将逐渐增加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尤其是中国的各方面情况，以满足东南亚华人了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需要。在形式上，东南亚华文传媒将顺应世界新闻传媒的发展潮流，呈网络媒体为导向，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共存的趋势；同时，东南亚华文传媒应积极参与传媒的国际交流和竞争，引入先进的传媒理念和技术设备，努力提高新闻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在经营方式上，东南亚华文传媒呈跨国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许多在东南亚创办的华文传媒远销中国和其他华人聚居地，如《联合早报》等；另一方面，其他地区的华文传媒也在东南亚出版发行，如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新民晚报》，台湾的《联合报》，美国的《国际日报》等；此外，东南亚华文传媒还加强了与其他地区的华文传媒之间的合作，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已经举办了两届，东南亚华文传媒积极派员参加，共商华文传媒发展大计。

本土化方面，随着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转型，东南亚华文传媒已经成为居住国

新闻传播事业的一部分，因此不但要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和政策，还要在保持华人民族传媒特色的同时，积极融入本土社会。本土化是东南亚华文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国际化的依托。从内容上看，东南亚华文传媒将继续以当地的华社新闻和国内新闻为主；从政治倾向上看，东南亚华文传媒则认同当地社会和政府；从功能上看，东南亚华文传媒除传播各类信息和传承中华文化之外，还承担协助华人融入本土社会，促进民族团结及当地政治经济发展之任务。近年来出现的华文报刊的双语版，有助于不同语种的受众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就是东南亚华文传媒本土化的有益尝试。

在华文传媒商业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同时，东南亚各华文传媒之间也呈现出融合的趋势。一方面，东南亚华文传媒在内容、形式、政治倾向乃至版面（节目）设计都趋于一致，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兴起，更是使东南亚华文传媒之间实现了信息共享。另一方面，东南亚华文传媒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统一，基本上都抱着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渴望中国早日统一，以前那种立场迥异、争论纷纷的现象消失了。此外，为了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东南亚华文传媒逐渐走向联合，一些华文传媒进行合并或者重组，更多的华文传媒加强了合作。与此相对应，东南亚华文传媒逐步走向规模化和集团化，一些大的传媒集团相继出现，如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新加坡国际传媒集团，马来西亚的南洋报业集团、朝日报业集团等，都控制了众多的华文媒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规模化和集团化是东南亚华文传媒发展的必由之路。

还有一点，对我们中国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化，以及中国和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东南亚华文传媒与中国的关系将再度紧密，并且在中国和东南亚频繁的国际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不过，与传统的、视中国为效忠对象的华侨传媒不同，华人传媒与中国的紧密关系是建立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交流的需要以及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同宗同源的文化联系基础上的。因此，无论对中国、东南亚华人还是对东南亚国家而言，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复苏及其与中国的密切联系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东南亚华文传媒将在广阔、健康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注 释

- [1] 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 [2] 同上，第156页。
- [3]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 [4] 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 [5] 同上，第298页。
- [6] 薛君度、曹云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 [7]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 [8] 同上，第185页。
- [9] [英] D·G·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73页。
- [10] 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08页。
- [11] 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 [12]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
- [13] 大洋网：《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日上午召开》，
http://china.dayoo.com/gb/content/2003-12/17/content_1329891.htm.

参考文献

1. 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
2.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
3.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4.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
5. 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6. 崔贵强：《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新加坡，华裔馆·南洋学会，2002年。
7. 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送你一条中国结》，香港，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3年。
8.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9. 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
10. 黄枝连：《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1. 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12. 王赓武：《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13. 周聿峨：《东南亚华文教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4.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15. 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16. 薛君度、曹云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
17. 梁英明：《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
18. 温广益主编：《“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

19. 李君哲：《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变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20. 廖小健：《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21. 方金英：《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
22. [美] 沈己尧：《东南亚——海外华人故乡》，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
23. [英] D·G·E·霍尔：《东南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24. 刘迪辉、李惠良等：《东南亚简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25.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26. [美]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议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27.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28.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
29.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30. 陈霖：《新闻学概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31. 胡钰：《新闻传播导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32. 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
33.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Singapore, 1995.
34. Leo Suryadinata,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7.
35. Tsuneo Ayabe, ed. *Nation-State, Identity and Religion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8.

致 谢

在拙文歇笔之际，我谨向这三年来给我关心和帮助的师长、同学和亲人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周聿峨教授，她不仅给了我学术上的教导和生活上的关怀，也给了我充分的信任和宽容，使我在有限的读研究生涯中不断成长；她的学术造诣、治学精神和高尚品格更是我一生的榜样，为我的学术和人生之路引航。

感谢曹云华、庄礼伟、候松龄、温北炎、廖小健、邱丹阳、陶季邑、骆丽、许梅、王子昌、龚泽宣、林锡星、邓仕超等老师，他们的授课丰富了我的知识，启迪了我的思想，使我在精深的学术世界里神游畅想。感谢张健民、卢美娟、沈新忠、李亚及东南亚所的其他老师，他们的工作排忧解难，为我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保障。

感谢龙向阳、代帆等师兄，他们经常给予我学术的指导和生活的帮助，他们的毕业论文还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还要感谢许许多多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他们不但给了我关心和帮助，也为我枯燥的生活增添了无限快乐。

当然忘不了年迈的父母，家人的支持和理解使我得以安心求学，我唯有努力进取，以不负所望。

陈雷谨识

2004年4月于暨南金陵苑

国际关系变动中的东南亚华文传媒

作者：陈雷
学位授予单位：暨南大学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Thesis_W025646.aspx